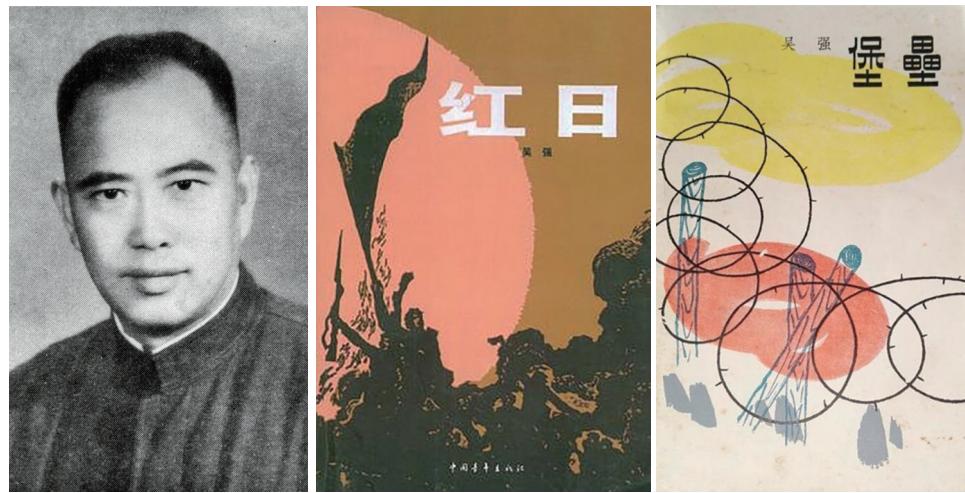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通海垦牧公司招佃详情

口田耀东 沈惠忠

# 名家吴强在苏中四分区参加反“清乡”

□施一鸣



## 抗战记忆

吴强（1910—1990），原名汪大同，笔名吴蔷，涟水高沟镇人。193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。1938年8月，在皖南参加新四军，次年入党。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、文艺科长、抗敌剧社秘书等职。1957年，他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问世，受到普遍重视。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，吴强一手拿枪，一手拿笔，创作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话剧《一条战线》《丁赞亭》及《繁昌之战》多首新四军歌词等文艺作品。1943年初，吴强南下浙东途经苏中时被留在四分区工作。

左图:吴强及其作品。

### 为粟裕军队提供情报

1943年1月，吴强等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凯的率领下，从阜宁出发南下浙东游击队工作，途经苏中军区一师所在地的时候，被苏中军区党委书记兼一师师长粟裕留了下来。当时，四分区正面临着紧张的反“清乡”斗争形势，急需抗日人才。吴强被分配到苏中四分区，任四地委敌工委员会委员、四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，从事日伪军工作。

他时而脱下军装，改扮成商贾，走南闯北；时而潜入敌营，依靠群众做侦察、分化、争取敌军的工作，干得扎实。为鼓励伪军重回正途，吴强还和程叶文等同志，借“三国”关羽的典故，共同编绘对敌宣传画《人在营心在汉》，投放到伪军据点。师政部主任钟胡光逢人就称赞：“吴强是个作家，不想他改行做敌军工作，也蛮在行。”

3月底，敌工部交给吴强一个任务，要他摸清日伪军实施“清乡”的具体时间和行动部署，以便我军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。吴强乔装打扮为一个商人，在向导小李的引导下来到南通金沙镇东五里庙，找到革命老妈妈瞿大妈。瞿大妈真名叫陈茂英，是位烈属，她熟悉金沙镇的地形，经常拄着拐杖、挎个竹篮子做掩护，为新四军探深情报。

夜幕降临，瞿大妈带着吴强，绕过敌人的岗哨，经过一座小石桥，又拐了几道弯，顺利进入街区，到了马复泰杂货店。店员一见是瞿大妈，急忙打招呼。瞿大妈佯装心痛病又发作了，到镇上来看病买药。她见吴强进入店内与内线对上了暗号，便买了包火柴回去了。

据内线报告：日寇“清乡”军事行动定在4月15日，为挽救其在华的垂死命运，这次“清乡”将抽调最有经验的61师4个联队、3个伪警大队，分两股合围苏中四分区。一股从通东的四甲、余东、包场一带，由西北向东南行进；一股从海门、三厂、悦来、三阳一带向西向东，采取拉网式行动。还有不少特工配合行动。

吴强探明了这一重要情报后，不敢耽误，当晚在敌人宵禁前离开金沙镇。几经周折，连夜赶到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掘港。谁知扑了个空，师部已经转

移。吴强又马不停蹄，根据自己的判断，朝西北方向走，一直走到次日中午，走到汤家园不远的地方，在一个三岔路口，他东张西望，盘算着往哪条路走。谁知，他这一身商人打扮和可疑的动作，引起当地民兵的注意，把他当作日伪特工五花大绑，扭送到东南警卫团政委洪泽处。

洪泽一见吴强，连声说抓错好人了，并亲自为吴强松绑，告诉他师部昨夜已转移到这里，并将他送到一师师部。吴强迅速向师长粟裕汇报了获得的情报。粟裕感到这个情报很重要，当即就写了一份电文：“……原定4月1日开始的‘清乡’军事行动，现延迟到4月15日开始。”并让吴强核对后，让机要员将电报马上发给各旅和军分区。

吴强离开汤家园后，粟裕率师部连夜转移。4月11日敌人查到粟裕踪迹，近千名日伪军突然扑到汤家园进行“清剿”时，粟裕已跳过包围圈，在离汤家园几十里的一个树林里隐蔽休息。

1943年6月，日伪继“军事清乡”后，开始“政治清乡”。为粉碎敌人阴谋，吴强深入敌占区刺探敌情。这年夏天吴强在茅镇敌人据点侦察，获得一份“武装编保甲”的情报，立即交给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。这份情报在反“武装编保甲”斗争中出奇制胜，立了大功。同年8月，日伪由启东转身到海门进行强化“清乡”。由于吴强等敌工干部事先提供情报，海启县委采取针锋相对的周密部署，使敌伪的“清乡”行动，终于以失败而告终。

### 孤身出入敌营谈判

驻扎在我三、四分区接壤地区栟茶、李堡、丰利等处的伪军35师经常对四分区的边缘进行骚扰，多次袭击我小洋口、环港、贲家巷等地。因该部对我方的多次警告不理不睬，我方决定给其必要的惩罚。经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批准，在1943年10月21日晚上，四分区集中了如皋（东）县警卫团和分区直属的特务营，在分区司令员陶勇的直接指挥下，一举攻克了伪军35师138团的据点李堡，歼灭了该团的4个连。后又经数次战斗，歼灭138团，活捉了团长纪雄。

苏中四分区军民经过3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，1944年夏，终于取得反“清

乡”斗争胜利。这场血和火的斗争，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吴强，也激发了他创作热情。吴强立即创作了鼓舞人心的《反“清乡”斗争胜利之歌》，由石林、陈大茨作曲，在四分区军民中广为传唱。

本军驻扬州的司令官南部请求派兵对新四军进行报复性“扫荡”，不但没有得到同意，反而受到南部的训斥：“损兵折将，作战无能！”为此，他们便放出消息，希望新四军留下宿营，不要攻打他们师部的驻地栟茶。丰利镇战斗之后的好几天里，他们也不敢出来进行抢掠烧杀了。

在这对我们有利的形势之下，四地委敌工委员会经过讨论研究，认为应当转移到这里，并将他送到一师师部。吴强迅速向师长粟裕汇报了获得的情报。粟裕感到这个情报很重要，当即就写了一份电文：“……原定4月1日开始的‘清乡’军事行动，现延迟到4月15日开始。”并让吴强核对后，让机要员将电报马上发给各旅和军分区。

吴强离开汤家园后，粟裕率师部连夜转移。4月11日敌人查到粟裕踪迹，近千名日伪军突然扑到汤家园进行“清剿”时，粟裕已跳过包围圈，在离汤家园几十里的一个树林里隐蔽休息。

1943年6月，日伪继“军事清乡”后，开始“政治清乡”。为粉碎敌人阴谋，吴强深入敌占区刺探敌情。这年夏天吴强在茅镇敌人据点侦察，获得一份“武装编保甲”的情报，立即交给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。这份情报在反“武装编保甲”斗争中出奇制胜，立了大功。同年8月，日伪由启东转身到海门进行强化“清乡”。由于吴强等敌工干部事先提供情报，海启县委采取针锋相对的周密部署，使敌伪的“清乡”行动，终于以失败而告终。

吴强当晚宿在环港。第二天，就是11月7日下午，他身穿一件浅灰色的长衫、头上戴一顶铁灰色呢帽，坐上一辆独轮车，上了栟茶。黄昏时分进入戒备森严的栟茶，当面向徐容晓以利害，宣传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到底、反对投降活动的政策。吴强思路缜密、言行不卑不亢，使徐容小觑不得。吴强当晚返回，第二天上午就到分区司令部所在的苴镇刘家园向陶勇司令、吉洛政委汇报了情况。当天下午，分区司令部就释放了伪团长纪雄。纪雄回到栟茶后，复任138团团长，从速召集被我方释放回去的官兵，恢复138团建制，并把团部安到了李堡。他们也没有敢再来丰利构筑据点。

苏中四分区军民经过3年多艰苦卓绝的努力，1944年夏，终于取得反“清

乡”斗争胜利。这场血和火的斗争，深深地教育和感动了吴强，也激发了他创作热情。吴强立即创作了鼓舞人心的《反“清乡”斗争胜利之歌》，由石林、陈大茨作曲，在四分区军民中广为传唱。

### 以四分区反“清乡”为题材写《堡垒》

苏中四分区反“清乡”斗争的经历深深烙在吴强心中，那里有勇往直前、流血牺牲的战友，有同生共死、朝夕相处的百姓。1957年吴强反映孟良崮战役的长篇小说《红日》一炮走红之后，他准备以苏中四分区反“清乡”斗争为素材创作小说《堡垒》。他开始了创作《堡垒》的前期准备。首先，他将当时的生活经历，作了回忆，写成片段的故事和人物素描，也就是将记忆中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用文字记录下来；其次是以“故地重游”，收集素材，去到南通、如东、海门、启东等地，重新向当年反“清乡”斗争中一起战斗过的战友、英雄及领导了解当年反“清乡”的战斗历程；还查阅当年出版、印发的根据地党报、党刊和有关资料、文件以及接管下来的敌伪报刊、档案等，收集到许多生动的宝贵材料。为进一步了解、熟悉民情风俗、生活习惯和有关的人物，1958年2月，吴强到如东县惕安乡（当年白桐本任区长的地方）担任乡党委副书记，在二总的一个生产队落户，与当地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重温当地反“清乡”斗争生活，积累素材。

1960年春天，吴强又三次访问南通，随即进入拟定《堡垒》的故事结构和设计人物、草拟作品梗概。这年秋天，他继续留住南通，在当年领导、参加反清乡斗争的一些同志热情支持之下，开始着手写，先后写了25万字。正想一气呵成时，接到上司张春桥要“大写建国十三年”的指示，《堡垒》创作再一次搁浅。

1966年冬天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《堡垒》被诬为“反动的堡垒”，书稿被造反派抄走，吴强也因此遭受浩劫。1978年，在粟裕关怀下，吴强得到了平反，并找回《堡垒》大部分手稿。1979年1月初，吴强终于根据最初的创作意图，重新拿起笔，以5个月的时间，完成了40多万字的《堡垒》（上部），历经20多年的磨难，终于1979年11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通海垦牧公司的主要财产就是围垦起来的土地，包括一至八个堤的路桥、堤面，共计十二万三千二百多亩。张謇在《垦牧乡志》中抒发豪情说：“藉各股东之力，以成建设一新世界雏型之志，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，虽牛马于社会而不辞也。”在围垦的土地上搞自治是理想，种优质棉花为大生纱厂提供原料是现实需求，张謇将两者统一到垦牧乡的建制中，所以曾为之“以二十年心力，得其子弟江导岷率各执事绸缪惨淡，与海潮争区酉二百里方里之荒滩”。

有土地必须有人耕种。1902年5月10日《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》发布：“愿招爱重身家，能勤俭成业之人为佃，共享永远公平利益。”押金叫订守，也称为顶首，只有交了押金才能租到地。刚开垦的地尚未成熟，需盖草排咸排碱，海潮又不时冲破海堤，棉农收获不稳定，一开始租地人并不多。时崇明县每亩收顶首十元，垦牧公司为吸引佃户打六折，每亩收六元，颇有优势了。老奸巨猾想“成业”之人便纷纷来承佃。为识别承佃人良莠，承佃必须由当地有名望的人“担保”，出具“保书”后才签订“承佃据”。承佃据制作细致，标明承佃的地块、亩数、收顶首数额，并附“缴租细则”，如：小熟每亩缴一角五分大洋，大熟按现场议收数按佃六四分成。确保租佃出去的每块田都对双方有益，这对佃农就很有吸引力。小熟种麦子和蚕豆，每亩收一角五分，只值一斤猪肉的钱，很便宜。为此，有些实力的佃户一家租种一亩，没实力的两家合种一亩，这些土地很快就成了香饽饽。公司的田二十亩一亩，两亩之间用河沟作为分界，每块地都标了号，摸到哪块就哪块，无须划分。为表示公允，公司把田分为一二三等，按照等级收款项。

种田须得住下来，这就要房子。公司统一给每户建草屋三间，俱是朝阳屋，与东西寔一样平，隔河相望便是田邻，用水养鱼俱无后顾之忧，交四十元大洋即可入住。如一寔田由两户承佃，就在这寔里建六间草屋。有居住不等于有埋人的地方，因为租佃地不得建坟。张謇遂在牧场堤东区划出一块“久长坪”作为佃户们的公共墓地，解决了佃户的一大难题，也使“使用权”的转让无后顾之忧。

为稳定地方治安，安置退伍兵也提上公司议事日程。1913年6月23日的张謇日记写道：“视一堤中东区及石堤板堤屯田，以退伍兵为之。”在屯田耕种的退伍兵不收顶首，仅收四分的田租。让其无负荷创业，并在播种季节由公司派出技术员给予指导。其中的优秀者，招收进公司当实际警察。

公司自1903年冬开始对外租田，至1908年底，承佃者共1302户，有6500余人在这些地里耕种，共收顶首13万多两。这笔钱当时可以建两个海复镇。

小熟收现金，大熟棉花与公司四六分成。1928、1929年，海复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减租减息，把四六分成减到三五五与六点五分成，使佃农更有奔头了。公司为确保产，培养有专责的评估人。评估人须有资质，先在公司的公田里练习，八九不离十才出门估算。为使评估人不营私舞弊，外出评估一律不准在佃户家用饭，口渴了连芦荟、甜瓜也不能随便吃，而是统一由公司在上午十点送茶水、脆饼慰劳，下午四点又派独轮车接回。不可谓不严，又很人性化，但仍免不了多评和少评，职员邱云章在回忆录中说他曾因同情少估产量的事。

佃农初来乍到无家底，春天麦子、蚕豆尚未成熟，家无余粮便要挨饿。公司派人去宁波采购山芋干，以采购价卖给佃户，运费、人员开支、山芋干沿途损失都由公司承担，剩余的才加价卖给垦区外农民。这种区别对待安定了佃户的心，也吸引老奸巨猾来耕种。为将这种施粥式的善举落实到位，五、六、七堤土地开始承佃时便建了“积谷仓”，佃户称“善仓”。善仓由公司出资储存50多石元麦（每石150斤），春荒季节借给佃农，麦收后归还时加一成利息，但实在困难者本利全免。

1902年霍乱肆虐，第一堤相继出现瘟疫。江知源急告张謇，张謇联系上海同德堂等名药房，采购了“雷允上蟾酥丸”等中成药，让公司贴出广告，免费“施救土夫及邻近乡人之病”，使垦区人平安过了瘟疫。

为使土地保值增值，垦牧公司原始股的面值标价300元，发行转让时，实际成交价达到400元至500元，使持股者增强信心。其中的增值部分是佃农辛勤耕作，改善土质换来的。

第一堤佃户张炎，1907年在公司承佃20亩地，1927年因遭天灾人祸卖掉土地使用权，其时土地已经成熟，价格上涨4倍，他以此还清债务后230大洋，继而前往大丰盐垦公司租佃三等地100亩，除去交顶首与写地送掉的礼金外，尚有100元余款，成为中等收入的农户。

租地的收益激励更多富人想通过租佃得利，并千方百计通过关系去“写田”。公司领导层明白其中的利益，也曾一度把部分二堤的六元顶首提高到十五元，接到垦民诉求后怕引起群体事件又降下来。后规定每个职员可写二寔田，事实上与分堤经理关系好的也能写到三寔、四寔。这种人得到租田并不自己耕种，而是把地租出去做“二粮户”。“二粮户”不种地，把地租出去再得利，这一类人，在土改时也难以定性，只有实在无法之人才种“三租田”。种三租田者无权在田上砌房子，种的是“走脚田”，老死也不能埋“久长坪”，种田抱临时思想，不想改良土壤，只想“刮地皮”，田越种越瘦，所谓“无恒产者无恒心”。垦牧公司控制写田规模，使耕者有其田，不使其掌控在游手好闲的人手里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这种写出去的田也不在少数，其时土地便成了商品，形成多种占有形式：有卖地的土地所有者。有向公司付顶首的原租户，有二粮户，有三租田者。这三项虽俱是土地使用权者，但权益和权利就明显不同。为逐利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大股东提出分地，与张謇的垦牧自治分道扬镳，公司内部分歧严重，这也是1926年张謇逝世后垦牧公司渐趋衰败的原因之一。

张謇曾感慨：“这种事业，我如不做，恐怕没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了。”下图：垦牧公司的承佃据封面及内里。



## 如皋天后宫和掘港天后宫

□赵一峰

天后，即妈祖林默娘，在中国沿海地区都有供奉祭祀，以福建地区最为兴盛。历史上如皋地区也曾营建过四座天后宫，即如皋天后宫、掘港天后宫、石庄天后宫、西场天后宫，过去民间有一种说法掘港天后宫是如皋天后宫的分院，如皋和掘港的天后宫似乎存在某些关联。

如皋天后宫在如皋城内东街钱家桥河西，大门朝东，后门通冒家巷，占地有十余亩，规模较大。主殿供奉天后、顺风耳、千里眼三座神像，对面有戏台，供信徒还愿唱“酬神戏”之用。如皋天后宫原来是明代礼部侍郎李之椿的花园，明末李之椿父子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，为清廷所害，家破人亡，改为天后宫祭祀妈祖。如皋明代以来，社会安定，自然灾害少，人口繁衍较快，商业逐步发达，各地客商纷至沓来，天后宫逐步成为福建籍客商的聚集地，民国后改称“闽中会馆”，又叫“福建会馆”，主要是福州一带客居如皋的商人联谊乡情的场所。明末清

场，应渔民要求的斋醮活动也就请火居道士来应酬。掘港港区过去有较多的火居道士，称作“师丈”，平时在家务农，有人请就做道场，都是“父子相继”的道士世家。

历史上如皋地处沿海，但天后信仰在如皋民间并不普及，如皋天后宫是福建籍客商的“会馆”，如皋东乡渔民也来烧香祭祀，后来海岸东移，如皋东乡的渔民祭祀天后不方便，改在掘港天后宫来祀奉天后娘娘。从掘港天后宫建造的年代看，会不会是如皋天后宫香火冷落，到掘港重建天后宫呢？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，一是没有历史资料表明，两者的前后关系；二是皋东渔民都有下海祭祀龙王的传统，掘港龙王早就在清初就有了，此外从五总到九总都有寺庙供渔民下海祭祀，其中八总庙规模最大，到清末一定程度上超过掘港天后宫，如东籍著名文史学者管劲丞就说到民国八总庙的香火鼎盛，天后宫的冷落。三是历史上有福建

客商在掘港建造庙宇的记载，明代万历七年闽人蔡三林建东林禅院，虽然天后的为人所建无考，但可以推断在妈祖信仰并不兴盛的如皋东乡，也应该是福建客商所为。

掘港天后宫和如皋天后宫在历史上来了个“接力赛”，如皋天后宫建设初衷是福建籍客商的“会馆”，如皋东乡渔民也来烧香祭祀，后来海岸东移，香火冷落，彻底失去了为下海渔民服务的功能。掘港天后宫为福建籍客商在掘港建立的同乡聚集地，但历史上掘港地区福建客商不多，后来为山西、安徽、镇江、南京等地客商取代，形成了此消彼长的格局，当时安徽的“新安会馆”，南京镇江的“金陵会馆”、“句容会馆”、“上江句会馆”，山西的“山西会馆”很是兴旺，并没有“福建会馆”的名号，后来掘港天后宫成为沿海渔民祈求平安的所在。清末海岸线进一步迅速东移，掘港天后宫香火也逐步冷落。1941年，抗日战争时，因掘港天后宫地处城乡接合部，日伪坚壁清野拆除了掘港天后宫。

## 建国前南通的公路管理

□王士明

《车纳捐暂行章程》，统一征收范围和标准，征收额和养路经费支出均由省建设厅管理。抗战期间，公路管理机构瘫痪，沿线居民在公路边种庄稼、任意挖路的现象严重。抗战胜利后，公路管理侧重于抢修南通境内的公路，恢复交通。1947年4月，南通工务总段成立，并接管了六合至吕四、南通至赣榆、如皋至新沂、南通至启东、启东至吕四等352公里的养护、管理任务。总段下设4个工务段、若干道班。

1949年6月，南通公路管理站成立，隶属苏北公路局，负责